



記敦煌寫本的佛經

王重民

公元四二一年，北涼滅西涼，四三九年北魏又勝北涼。從此，北魏在敦煌派遣了地方官吏。當後涼、西涼和北涼統治的時候，涼州地方的佛教已經大大興盛起來，涼州成了翻譯佛經的重要地區。本來在西晉初年，月支人後裔的竺法護就是在敦煌譯經的，中譯本也就必然先在涼州流傳。釋道安在三七四年編成的『綜理象經目錄』，內有『涼土異經錄』五十九部，七十九卷，可見涼州從很早的時期譯經事業就很盛了。有名的譯經大師鳩摩羅什 (Kumārajīva 344—413) 就是隨着呂光住在姑臧的。另一位著名的譯經大師曇無讖 (Dharmakṣema 385—433) 也是在姑臧翻譯了『大般涅槃經』等十幾部大乘經典。曇無讖是先到敦煌住了幾年，四二一年北涼滅了西涼，沮渠蒙遜才把他請到姑臧譯經的。這時候，中原佛教也已盛行，所以苻秦和北魏爭着聘請鳩摩羅什和曇無讖東來，沮渠蒙遜不肯答應北魏的要求，甚至把曇無讖殺死。四三九年北魏滅了北涼，這時候，北魏又已經統一了中原地區，譯經地點就東移了。所以北魏派遣東陽王元榮鎮守瓜州 (當時敦煌是瓜州的首府) 的時候，他便大量傳寫佛經。而當時所寫的佛經，竟有十多卷在敦煌保存到了今天。

敦煌千佛洞，據敦煌所出的文獻記載，最早是在公元三六六年由樂樽法師開鑿的，隨後又有法良禪師營建。這時候，鳩摩羅

什、曇無讖雖說都還沒有到敦煌，但涼州的佛教已經興盛起來，所以有不少的僧徒選擇了鳴沙山去開窟建寺。約距樂樽開窟的五、六十年以前，著名的書法家索靖 (敦煌人，239—303) 曾經在鳴沙山上題過「仙巖」兩字，這表明在樂樽以前千佛洞可能已經被選為佛教聖地。從此以後，開窟建寺，雕像寫經，一直繼續下來，就裝扮成爲我們今天還能看到的梵宇琳宮互相輝映的千佛洞了。

自從四三九年北魏滅北涼之後，敦煌成爲北魏統治瓜州並控制西陲的重鎮。從這時候起，一直到七八一年爲吐蕃國所佔據，敦煌經歷了北魏 (以及西魏北周)、隋、唐三個朝代，特別是隋 (581—617)、唐 (618—781) 統一時代，敦煌地方在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上，以及在東西交通的孔道上，越往後越顯出它的重要性。因此，駐在敦煌地方上的土族地主也越往後越多，他們對本地地方以及東西方地區區的壓迫和剝削也就越來越大。他們剝削來的錢財有一部份供他們奢華浪費，另外不小的一部份就用在千佛洞上開窟建寺、寫經贖罪等方面。在千佛洞，隨着寺院的開創，僧人的加多，佛教寺院的莊園經濟從而建充起來。這些情況的發展，應該說是在北魏、西魏、北周時期 (439—580) 開其端，到隋唐統治時期 (581—781) 達於極盛。在隋唐極盛的

時期，佛教寺院的經濟和文化鞏固以後，寺院的藏經圖書館也逐漸發展起來。寺院中的僧人抄寫、購買一部份，又利用佈施（佈施經卷或出錢寫經）的方法，收藏了很大一部份的佛經。在公元七八一—八四八年吐蕃統治的時期，地方上的生產遭到了很大的破壞，但佛教寺院的經濟剝削並沒有減輕，門窟建寺與抄寫佛經也沒有減少，所不同的就是以更大更迅速的份量增加了藏文的佛經寫本。但由於地方經濟的破壞，素墨的質量降低，所以從七八一年以後，佛經的寫本粗糙了，字跡的端整美觀也不如以前了。尤其在八四八年以後，敦煌地方雖說相繼建立了以張氏、曹氏爲首的地方政權，與唐代的中央政府建立了聯系，但由於中間被迴鶻的軍政力量所阻隔，與唐朝的交通道路不能暢通，唐朝從七五五年安祿山叛亂以後，國家的經濟力量大大衰退，對於敦煌不能有所接濟。這就使得這一時期以後（838—906）敦煌的經濟更差，反映到佛經上面的就是寫本紙墨低劣，甚至比吐蕃統治時期也不如了。

敦煌佛經上面有一部份打着三界寺的藏書印記，說明在最幾的一段時期，即張氏、曹氏統治時期，敦煌的佛教寺院圖書館以三界寺爲最大。但敦煌所出的圖書那樣複雜，不像是本來爲一個佛教寺院圖書館所專有，所以有人推測是西夏的兵力沒有達到敦煌以前，有人（應該說是敦煌的都僧統）把若干寺院的藏經統統藏在第二八八洞內，並在前面築起了複壁，就逃走了。大概後來這些人沒有回來，地方再沒有人知道那件事情，所以一直封閉到一九〇〇年才被發現、打開。

敦煌寫本書內最後的一個年月爲「至道二年」（906），但西夏佔據敦煌是在一〇三六年，如果說第二八八洞的複壁是封閉在一〇三六年或稍前，不可能沒有996—1036年間的文獻，但裏面竟沒有這四十年間的文獻。第二八八洞究竟封閉在什麼時候，問題還沒有得到完滿解決。

總之，封閉了將近九百年的一個佛教寺院圖書館，突然把九個世紀以前的藏經獻給九個世紀以後的人，真是一個非常驚人的

事件！其中所包括的數以三萬計的佛經和各種文書，在佛教史和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意義，是不可估量的！可惜的是這個第十世紀的佛教寺院圖書館在一九〇〇年，發見後不久，便被帝國主義分子劫散了。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間有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 1862—1943）和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隨後有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探險」的分子。直到一九一〇年清政府的學部才把被劫餘的部份運到北京，現存在北京圖書館內。

斯坦因劫往倫敦的現藏不列顛博物院（British Museum）圖書館，伯希和劫往巴黎的，現藏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爲了說明其中的佛經部份，先大致談一談那些經卷的收藏和整理情況。

一、被外國人劫餘的，一九一〇年由學部交給京師圖書館所藏的敦煌經卷，在一九二二年由陳垣整理編目，一九三一年出版了「敦煌劫餘錄」六冊，十四帙。共著錄佛經（包括極少數其他文件）八六七九卷（這裏是以一個編號爲一卷，但有時一號內包括兩卷或多卷，一九六二年點查核實爲八七三四卷）。一九二九年又從編餘的殘卷殘片中，選出一九二卷。這些，都藏在現在的北京圖書館內。又自從一九四九年以後，政府特別關心這份寶貴文化財產，對於舊有的點查整理以外，還大力購買並勸收藏家捐贈，到一九六三年，在上述兩部份之外，又收入了大約二千卷。現在北京圖書館所藏的敦煌寫經原卷已經接近一萬二千卷了。其中，佛經的比重最大，約一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這就是說，約有佛經一萬一千五百卷。

二、斯坦因盜劫的總數，據他自己說是九千種，據一九五七年出版的翟理斯博士所編的「敦煌漢文寫本書解題目錄」（Lionel Giles: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57*）是六九八〇個卷子和小冊子。又有五百多件佛教美術品，分藏在不列顛博物院和印度的新德里博物院裏，有一九三一年魏禮編的「斯坦因盜畫

目錄』Arthur Waley: A Catalogue of Paintings recovered from Tunhuang by Sir. Aurel Stein Preserved in the British Museum and in the Museum of Central Asian antiquities Delhi, London, 1931)。翟理斯的目錄內，包括五十多個梵文、藏文、厥突、于闐、回紇等文的卷子（也多數是佛經）。另外還有大量的（據九千種的數量統計，應該不少於一千五百卷）西藏文卷子，舊藏在倫敦的印度事務部（Indian office），現在不知在何處。在上述六九八〇個漢文卷子和小冊內，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佛經，這就是說，其中大約有佛經六千卷。

三、伯希和盜劫的確切數目不大清楚，大約不少於五千件。在這一堆漢文卷子中，中國的四部書和歷史文獻最多，所以最有名。據拙編『伯希和劫經錄』，內有大約二千五百多個漢文卷子，小冊子和版畫葉，還有一百來個梵文、藏文、厥突、于闐、回紇等文的卷子。其中佛經約佔百分之六十五，即大約為一千六百卷。這裏還有少數的佛教美術品；但伯希和盜劫的佛教美術品的絕大部份藏盧佛爾宮（Palais du Louvre）和紀梅博物館（Musée Guimet），由於沒有一個總目錄，數量不詳。至於藏在國家圖書館的藏文卷子，已由拉盧女士編出一個『敦煌西藏文寫本目錄』（Marcelle Lalou; 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 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Fonds Pelliot tibetain Paris, Tome I 1939; Tome II 1950.），這兩冊，已包括了一二八二個卷子，據她說，不久還將出第三冊。看來伯希和盜劫的藏文卷子，大約接近二千的樣子。

四、除斯坦因、伯希和盜劫的以外，散在國內外的卷子數量也不小，但無法統計。大約估計起來，在三千與四千間，其中已經有二千卷歸了北京圖書館，在中國、日本以及其他國家私人收藏的數目已不很多，大概不過一千五百卷的樣子。有人可能認為這個估計數目太少，其實不算少，這是一個比較公道的估計數目。

我們可以大致得出一個總數，就是說，一九〇〇年敦煌千佛洞第二八八洞發見出來的那個佛教寺院圖書館，共有漢文和其他

文字的卷子、小冊子、佛教美術品等約為二萬八千件，最多不過三萬件。其中漢文經約為二萬卷，最多超不萬二萬二千卷。

現在進一步專論這二萬卷的佛經。

這二萬漢文寫本佛經中，數量最多的是隋唐時代最通行的五部大經，即『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金光明最勝王經』、『妙法蓮華經』和『維摩詰所說經』。到了唐代末年『妙法蓮華經』中的第二十五品——『觀世音經』和一部偽經『佛說無量壽宗要經』（亦稱『大乘無量壽經』），在敦煌特別流行，寫本也就特別多。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北京圖書館藏一四一二卷，斯坦因劫往倫敦的有七五九卷，共二一七一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兩處共有一四一七卷（北京九二八卷，倫敦四八九卷），『金光明最勝王經』八零九卷（北京五六九卷，倫敦二四零卷），『妙法蓮華經』二五五九卷（北京一六九八卷，倫敦八六一卷），還有『觀世音經』（『妙法蓮華經』的第二十五品）一九九卷（北京七一卷，倫敦一二八卷），『維摩詰所說經』六八二卷（北京四四九卷，倫敦二二三卷），『佛說無量壽宗要經』八零一卷（北京五一三卷，倫敦二八八卷）。單這六部大經，而且只統計了北京（只限『敦煌劫餘錄』中所著錄的），倫敦所藏的就八六三八卷。再加上伯希和劫往巴黎的和散在國內與日本的，這六部大經的總數估計為一萬二千卷是不會有多大的差錯的。這就佔去敦煌寫經總數的百分之六十。

雖說這六部大經的總數佔去了敦煌石室所出佛經的百分之六十，由於其餘的經、律、論的複本不是很多，它的品種還是不少的。北京圖書館所藏的就有將近四百個品種，隋唐時代新譯本和通行的重要佛經大概都有，此外還包括着一些極可寶貴的古佚經和罕傳本；就是一些唐末人和敦煌本地人的註解，以至疑偽各經佛文等，也都是我國佛教史上的重要參考資料。

這些佛經寫本的年代，跨越了七個世紀（從第四至第十世紀）。在這樣漫長的歲月裏，所用的紙墨和抄寫的字跡隨着時代的發展，表現着各不相同跡象。大約說來，北魏到隋代的一段，紙

幅較低，紙色雪白，不用潢染，筆跡猶是隸體，每行多在二十字以上，三十字上下的很普通。隋唐時代（隋代到天寶以前），紙幅與前一時期差不多，但絕大多數是經過潢染，而且捶擣得很光滑，筆跡整齊，逐漸失去隸體而成爲楷體字。每行都在二十字上下，超過二十字的不少。從吐蕃統治時代一直到宋代初期，紙幅逐漸變高了，也很少潢染，以至後來幾年，沒有潢染了，紙面也粗糙了。字跡端正的不少，不但書法很惡劣，也很草率，特別是佛經的註解，字體更是潦草。

卷子的長短，從北魏初年到唐代天寶年間，經常是二三十紙，每紙約長一尺半（最長的爲1.54尺，短的1.45尺），二十八行（也有二十六七行的）。天寶以後紙幅雖稍高，但逐漸縮短，一般是1.5尺，行數極不固定，卷子逐漸加長，以至長的很難展讀。大概就是這樣的時候，出現了梵夾裝和小冊子。不論卷子，梵夾冊或小冊子，都有用墨尺或鉛尺打的墨線欄。

佛經寫本中比較長的卷子，根據翟理斯博士所記，斯4052『金剛經註』長九九英尺，斯4136『法華經義疏』長九〇英尺，斯6713『淨名經關中（疏）釋批』長八〇·七五英尺，又陳垣所記北京圖書館的藏卷中，「致」字71號。『淨名經集解關中疏』爲五八紙，一六七零行，又「致字」72號亦『淨名經集解關中疏』爲五四紙，一五九八行。此卷子的抄寫時期較晚，按每紙長1.3尺計算，長度也有七零公尺以上。

至於這些佛經書寫的年代，在佛經的卷尾往往有寫書人或施捨人的題記，包括有書寫的年月、地點、校寫人和施捨人的志願等。在這二萬卷佛經裏？抄寫最早的一卷據現在人的考證，大概是中村不折氏所藏的『譬喻經』，卷末題：「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於酒泉城內□□中寫訖」。這個「甘露元年」應該就是前秦符堅的年號，即公元三五九年。伯希和劫走一卷『法句經』（伯2381）極可能是同書的同一個寫本，因爲『法句譬喻經』的前題作『法句經』，後題『譬喻經』，在後題的下面才標記書寫的年月和地點。又斯坦因劫走的一卷『十誦比丘戒本』（斯797）

末題：「建初元年（405）歲在乙巳十二月五日戌時比丘德佑於敦煌城南受縣戒」，建初是西涼李暠的年號，這應該是年月的第二個古本了。甘露元年（359）和建初元年（405）是在樂傳於三六六年開窟建寺的前後，而且德祐受戒是在敦煌城南，也許就是千佛洞或者離千佛洞不遠的地方，這都反映了敦煌佛教發展的史跡，也反映了千佛洞的佛教寺院在開鑿後不久，就把它以前和以後所寫的佛經好好保藏起來，一直傳到今天。雖說不是最古的寫本，至少是寫在紙上有年月可稽的最古的寫本了。

北魏時代的寫經，被保存下來的不少，其中以東陽王元榮佈施的寫本爲最多。元榮亦名元太榮，是太宗明元帝（409—423年在位）的玄孫，他開始任瓜州刺史年月不詳，但五二九年他被封爲東陽王時，已經是瓜州刺史，這時候，他佈施了不少佛經。據北京圖書館「菜」字50號伯2123號兩卷『大智度論』和中村不折所藏的『律藏分』的題記，公元五三二年，元榮遣息叔和（息即子息）去京師朝見皇帝，爲了請佛保佑來回道路上的平安，他佈施了『無量壽經』一百部，『摩訶衍』一部百卷，『內律經』一部，五十卷，『賢愚經』、『觀佛三昧海經』、『大雲經』各一部。又北魏永熙二年即公元五三三年，元榮又爲了請求毘沙門天王保佑他無病，又佈施了『涅槃經』、『法華經』、『大雲經』、『賢愚經』、『觀佛三昧海經』、『金光明經』、『維摩詰經』、『藥師經』各一部（見斯415『大般涅槃經』卷第三十一的題記）。

元榮的卒年不詳。他死後，他兒子元康繼任瓜州刺史，但不久元榮的女婿鄧彥把元康殺死，篡奪了瓜州刺史的統治權。現存五四二年「瓜州刺史鄧彥妻樂昌公主元敬」寫的『摩訶衍經』卷第八（原書一百卷），這類「罪孽深重」的人總是寺院圖書館的貢獻者。斯坦因劫經內，還有北魏太和三年（公元四七九）洛州刺史昌黎王馮晉國寫的『雜阿毘曇心經』卷第六，他一次就寫了一切經一四六四卷。洛州不在敦煌，這卷經是從外地流傳到敦煌的。說明這時佛經的最大施捨者，多是當時最高的貴族，最大的

官僚和地主。

到了隋唐時代，寫經的物質條件好了，書法也進步了，特別是初唐時代寫的佛經，真是達到了紙墨書法並好，極可寶愛。後代人都贊揚唐代寫經，不是偶然的。

隋唐時代的寫經所以好，不只在於紙墨和書法，還由於所根據的底本是最好的本子，並且寫完以後，更由專門校勘的人一校再校，錯字也非常少。這當是由於六朝末年，封建王朝政府的秘書監開始注意了寫書的質量，特別「正字」官專門校勘，並且在寫本書內消滅俗體字，唐初的秘書監顏師古把寫書人應該使用的正體字規定成爲「字樣」一書，那些規定和方法，也就逐漸爲寫佛經的人所採用。敦煌所發現的佛經，有很大的一部份（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是這時候寫的。有一些是隋唐中央政府寫經的原本，也有從政府校、寫本傳抄的。在這些原本或重鈔的卷尾。往往同樣保留着翻譯人、譯定人和校寫人的題銜，如斯2423「佛說示所犯者法鏡經」和斯2962「佛說校量數珠功德經」的卷尾都有大致相同的題銜。茲錄「佛說示所犯者法鏡經」的題記如下：

景龍元年歲次景（丙）午十一月廿三日三藏法師室利末多唐言妙惠於崇福寺翻譯

大興善寺翻經大德沙門師利筆受綴文

大慈恩寺翻經大德沙門道安等證義

大首領安達摩譯語

至景雲二年三月十三日奏行

太極元年四月日正議大夫太子洗馬昭文館學士張齊賢等進

奉敕太宗大夫昭文館鄭喜王詳定

奉敕秘書少監。文館學士韋利器詳定

奉敕正議大夫行太府寺卿昭文館學士沈佺期詳定

奉敕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右諭德昭文館學士延悅詳定

奉敕銀青光祿大夫黃門侍郎昭文館學士上柱國李乂詳定

奉敕工部侍郎昭文館學士上護軍盧藏用詳定。

奉敕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權兼檢校右羽林將軍上柱國壽昌縣開國伯賈膺福詳定

奉敕右散騎常侍權兼左檢校羽林將軍上柱國高平縣開國侯徐彥伯詳定

奉敕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昭文館學士兼太子右庶子崔湜詳定

奉敕金紫光祿大夫行禮部尚書昭文館學士上柱國晉國公薛稷詳定

延和元年六月廿日大興善寺翻經沙門師利檢校寫

奉敕令昭文館學士等詳定人目錄訖流行

在這一時期內「詳定人目」的可能都有這種相類的題銜，而且稍久之後，也就成了必備的「官樣文章」。但不論如何，這樣做法是能夠或多或少提高或者保持佛經的鈔寫質量的。敦煌所出這些抄寫較好的佛經，其中有不少經卷是從長安，或者從國內其他地方傳來的，但敦煌本地方的寫本其質量並不稍差。這說明當着全國經濟發展興盛的時期，就是在西陲的敦。也有一定水平，或者說與全國其他地方基本上能夠平衡。有一些題爲敦煌人書寫的卷子，其紙墨之精良，與書法的端整迥秀，和一些官寫本是可媲美。

敦煌佛經內有不少的長安官寫本和其他地方的寫本，說明由於敦煌在交通上的重要，不論官吏和僧道經常經過敦，或駐在敦煌，他們就帶來了大量的外地寫經。當然相反的，也有一些敦煌寫經被他們帶到外地去。每當經濟發展的時期，全國的商品和文化交流就必然加速加劇，敦煌甚至有一些南朝的寫經，不可能是北魏或北周時期傳來的，必然也是在隋唐統一時代從長安或者從江南直接傳來的。如中村不折藏的天監十一年（512）寫的「摩訶般若波羅密經」卷第十五，普通四年（523）寫的「華嚴經」卷第二十七，以及伯希和劫走的天監十八年（519）寫的「出家入受菩薩戒法」卷第一（伯2196）、至德四年（586）寫的。「摩訶摩耶經」（伯2160）。這都說明，隋唐（天寶以前）時期佛經在全國範圍內的流通是極其交錯，極其迅速的。這一時期的一個特點，就是敦煌人所藏的不一定就是敦煌人所寫的。

（未完）